

出于政治需要,张作霖为女儿择婿时,最看中的就是对方的门第与家世。虽然儿女和夫人们对这种包办婚姻十分不满,但慑于他的威严,最终只能无奈接受。在这种包办婚姻之下,张作霖的子女大多从小就定了亲,唯独三女儿张怀瞳因张作霖婉言谢绝了赵尔巽的提亲,直到张作霖去世前也未曾订婚。

张作霖为何拒绝“恩师”提亲

说起赵尔巽,那可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风云人物。他出生于铁岭的一个官宦世家,先世隶汉军正蓝旗。其祖父、父亲均为进士出身,兄弟四人中有三人(包括赵尔巽)考取了进士。赵尔巽先后担任过湖南巡抚、盛京将军、东三省总督之职。东北王张作霖和赵氏家族这样的人家结亲,可谓门当户对。可张作霖为何要拒绝赵尔巽的提亲呢?张学良晚年口述历史揭开了这一谜底。

张学良说:“我们兄弟姐妹都一小订的婚,很奇怪,就我三妹没有订婚……到了北京,我父亲当大元帅时,那时赵尔巽还在,赵尔巽想给他儿子求婚,想娶我们家女儿。那时我只有一个三妹了,我父亲就没有答应。什么原因呢?因为赵尔巽呐,我总跟他开玩笑,管赵尔巽叫爷爷,那么我的妹妹也就管赵尔巽叫爷爷,他儿子高我妹妹一辈。我父亲很讲伦理,他就对这事不愿意,没答应。”

事实上,张作霖的确一直把赵尔巽尊为“恩师”和“前辈”。不仅如此,张作霖对赵尔巽还存敬畏之情,这恐怕很大程度上缘自赵尔巽对他的提拔和重用。

早在1906年,盛京将军赵尔巽就



因为张作霖剿匪有功,将他从新民府游击马队中营管带提拔到了奉天巡防营右路统领的位置上。后来,赵尔巽任命张作霖为奉天城防司令,使得张作霖成了奉天省地方最大的军事首领。之后,张作霖又继续与革命力量对抗,暗杀了奉天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张榕及其好友宝昆等人。张作霖的做法令赵尔巽十分满意。赵尔巽在给清廷的奏折中盛赞张作霖:“该统领不动声色,连毙三凶,实足以快人心而彰显戮。”清廷因此破格升赏,任张作霖为“关外练兵大臣”,赏戴花翎,并将其所部改为第二十四镇,由张作霖任统制,相当于师长,不久又兼任巡防营务处总办。军事实力的增强,使张作霖的腰杆硬了起来,具备了涉足政界的重

要条件。自此以后,张作霖逐渐走进了东三省中枢的奉天官场,成为了左右奉天军政大权的举足轻重的人物。

张作霖对赵尔巽提拔和重用自己的那份情谊,一直心怀感激。因为辈分的缘故,张作霖拒绝了赵尔巽的提亲,但心中却一直怀有内疚之感。张学良回忆说:“不久啊,这个赵次帅就病故了。我父亲非常难过,为这件事情难过,说了好几回。他说我呀,真觉得对不起他,好像我阔气了,他想求婚我没答应。我怕他误会,我不肯的原因不是为别的,就是因为辈数。我知道,我应该答应他。”

张作霖生前的这份遗憾,在他去世之后,张学良对其进行了弥补。等回到奉天之后,张学良和张作霖的二夫人卢氏商量道:“他们两个老头都有这个心意,我是自由派的,就让他们两个结婚好不好?”卢夫人很开通,赞成地说:“这样吧,咱们让他们两个会会面。他们如果自己愿意就好,如果不愿意,我们也不能硬配。”就这样,张家把赵尔巽的独子赵世辉请到了奉天,结果赵世辉和张怀瞳相处得很好,于是就这样结合了。

(据《华商晨报》)

张宗昌的老婆们 号称“国际纵队”

张宗昌在军阀中,是名声最差的一位,手下的军队没有纪律,比匪还匪,治理地方没有章法,明抢暗夺。但是,如果让他的狐朋狗友来评价,这个人简直好极了:好客,够朋友!吃他的饭,没问题;用他的钱,没问题;看上他的小老婆拐了走,绝不会追杀,下次见面,居然会忘了。

出手大方、喜欢交朋友的张宗昌,属于黑社会的好人。他的“好”是建立在正常社会的痛苦上的,在正常的社会里,无论是他压榨的下层,还是可以幸免的上层,都不会喜欢他的这种“好”。不幸的是,他并不知道这一点。不仅跟京沪两地的上流社会打交道时豪放如故,就是见了外国人,也会拼命展示他的“优点”。

张宗昌政治生涯的最后几年,是山东的统治者,统治的触角一度延伸到江苏和上海。为了他那点黑社会的“好”,山东人民可倒了霉,从此破了军阀一般不祸害自己家乡的戒条。成群结队的绿林好汉、马贼会匪,都来投奔他,今儿来,明儿走,一进一出,山东的百姓屡遭荼毒。1927年秋冬,山东大饥荒,成千上万的饥民被饿死。好心的传教士把消息传到美国,《纽约时报》被要求参与募捐,救助灾民。报社派他们在中国的记者哈雷特·阿班到山东走一遭,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张宗昌对这个美国记者展示了他的慷慨大方和好客,他在督军府招待阿班,桌子上是记者前所未见的山珍海味,外加昂贵的法国香槟酒和白兰地。用记者的话来说,宴席丰盛到了罪恶的地步。为了尊重这位外国朋友,张宗昌居然吃的是西餐。厨子是特意从北京六国饭店接过来。宴席用的餐具是从比利时进口的,每件餐具,包括咖啡杯,都是切割玻璃的。张宗昌告诉他的客人,这套餐具价值55000美元。好客的张宗昌也没忘对记者炫耀他号称的“国际纵队”——40人组成的老婆队伍,有法国人、日本人、俄国人和朝鲜人。陪酒的就是张宗昌的这些女人。当然,如果记者有兴趣,他都是可以让这些女人中的任何一个去侍寝的。

然而,跟张宗昌预想的相反,享受了他殷勤招待的美国记者居然没有“良心”,在发回报社的报道中,详细报道了遍地奄奄一息的灾民、张宗昌的盛宴和他价值连城的餐具以及陪酒的姨太太队伍。最后的结论是,山东的灾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美国人的捐助最大的可能是便宜了这个恶徒,如果不加援助,反倒能够激起人们对他的反抗,至少,人们会欢迎北伐军早些到来。

最后,原本可以期待的美国救援没有了。正如记者预料的那样,张宗昌一败再败,很快滚出了山东。 (据《五光十色说历史》)

杜月笙强制张学良戒毒



张学良由于在“九一八事变”中执行不抵抗政策,备受国人苛责。热河沦陷后,他引咎辞职。1933年3月12日,张学良与夫人于凤至、女秘书赵四小姐等人悄然南下,前往上海。

得知张学良一行将抵沪,杜月笙便把福煦路181号已关闭的赌场装饰一新,请张学良入住。杜月笙和张学良并无深交,但此时杜觉得正是结交的好机会,这个时候拉张学良一把,他将来是不会忘记的。然而不久后,福煦路的大门口出现了一颗炸弹,炸弹虽然后来被拆除了,但与炸弹在一起的还有一封信,信上说:“请张学良这个卖国贼即日离开上海,否则,第二颗炸弹送来,定叫他粉身碎骨。”

炸弹和信令杜月笙又惊又怒。他觉得这是对他的公开挑战——张学良来上海,由他负责出面招待,上海尽

人皆知。再说,这炸弹要是真爆炸了,伤了张学良,那杜月笙今后在上海滩还能混得下去吗?

经调查,杜月笙得知这件事是王亚樵干的。他叫人设法去见王亚樵,试图花钱免灾。但王亚樵郑重声明,此举是为国家民族大义,立誓分文不取。他让杜月笙转达张学良,要么马上回到北方去,重整兵马,向日本人开战;如果不战,请返回东北,自杀以谢国人。如果既不愿战,也不肯死,那么,请将全部财产交出,购买军火,接济关外的义勇军。“以上三条,张学良必须择一而行,否则,我的第二颗炸弹就扔出来了。”

杜月笙听了微微一笑,让人转告王亚樵说:“张学良如果有罪,国家自有法律。你在上海私自动,张学良是我的客人,我有保护之责。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必要有无意义的牺牲。”

王亚樵自知在上海滩要真和杜月笙抗衡还是有些力不从心的。于是,他表示:“既然是杜先生的面子,那我就放宽一点,请张学良限期离开上海。不然,拼了我这条命,我也要履行诺言。”

杜月笙听闻,派人转告王亚樵说:“你放心吧,张学良在委员长的教诲下已经在奋发振作,洗心革面了。他现在正在请美籍医生米勒帮着戒毒。戒毒完成,最多不出一个月,他就要出洋考察。”

王亚樵不知道张学良还有吸毒的毛病,他决定先观察看看,暂时不动杀机。开始,张学良只是吸吸鸦片,后来,他的毒瘾越来越大,扎吗啡扎的胳膊上全是针眼,连老烟枪杜月笙见了都骇然。杜月笙把自己力戒鸦片的经过告诉张学良,希望他也能戒除毒瘾。张学良听后颇受影响。

然而,张学良中毒太深了,每15至20分钟就得注射一针。想戒毒,谈何容易?米勒医生提出,由他来指挥张学良的卫队和亲随,并赶走整天围在张学良身边想方设法为少帅减轻痛苦的张学良的私人医生。米勒先替张学良灌肠,然后是各种治疗方法轮番上阵……张学良痛苦得大喊大叫,鼻涕眼泪流个不停。米勒告诉杜月笙说:“此时只有下狠心,才能解决问题。”杜月笙同意了。米勒便停止使用镇静剂、麻醉药,把张学良捆在床上,任他挣扎,一直到筋疲力尽。就这样,经过个把月的时间,张学良终于成功戒毒。

许多年后,张学良才知道,为了他戒毒,一些不明真相的东北军将领以为杜月笙要借机除掉他,竟派代表到上海来,扬言如果情况不妙,就武力解决杜月笙等人。好在杜月笙提前得到消息,把代表打发走了。

(据《老年生活报》)